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俄] Т.И. 奥伊泽尔曼 著

元 哲 学



013067852

B089

119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元 哲 学

[俄] Т.И. 奥伊泽尔曼 著
高晓惠 译



北航 C1673924

人民出版社

B089
119

责任编辑:邓仁娥

版式设计:鲍春琴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哲学/[俄]T.I.奥伊泽尔曼 著;高晓惠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

ISBN 978 - 7 - 01 - 011424 - 8

I . ①元… II . ①奥… III . ①哲学史-研究-世界 IV .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4423 号

元 哲 学

YUAN ZHE XUE

[俄]T.I.奥伊泽尔曼 著 高晓惠 译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

字数:344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1424 - 8 定价:6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

主 编：俞吾金

副 主 编：陈学明 吴晓明 张庆熊

执行编委：鲁 路 王凤才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凤才 王金林 王新生 邓安庆

冯 平 孙小玲 孙向晨 张双利

张庆熊 汪行福 陈学明 邹诗鹏

吴晓明 吴新文 吴 猛 汪堂家

周 凡 罗亚玲 林 晖 俞吾金

莫伟民 鲁 路 鲁绍臣 魏洪钟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

序 言

俞孟金

1985年,复旦大学哲学系建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室,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建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1999年,在这个教研室的基础上,吸收了外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部分成员,成立了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2000年,该中心被评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小基地”)。2004年,在“小基地”的基础上建立的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基地又被评为“985”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大基地”)。

自大基地建立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能编辑、出版一套译丛。尽管国内多家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合作,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推出了一批译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我们认为,这些已出版的译丛仍然存在以下的不足之处:

一是学科分类的束缚。从内容上看,已经出版的译丛,或者是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或者是关于国外其他思潮的。其实,无论是国外学者的思想,还是国外思潮的内容,都超越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国外其他思潮”的简单两分。比如,萨特、哈贝马斯、德里达等著名学

者,既是当代国外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又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标志性人物。又如,现象学、精神分析、分析哲学、存在主义、诠释学、结构主义、实用主义等国外思潮,在其发展中无不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元素。我们之所以把自己打算出版的译丛命名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就是希望打破学科分类的壁垒,以更灵活的方式,把整个国外思潮中富有原创性和影响力论著译介进来。

二是成果形式的限制。在通常的情况下,译丛是由译著构成的。众所周知,不但著作的出版会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而且著作的翻译也会有一个较长的周期,从而使译著提供的信息相对滞后。而我们希望本译丛能够打破成果形式上的限制,对重要的译著和译文兼收并蓄,我们甚至希望把翻译的重心放到译文上,因为论文通常包含着更为前沿的信息,翻译的周期相对也比较短,更易对读者的思想产生启发。

三是论著选择的盲点。人所共知,不同的译丛体现出选家的不同眼光。如果说,不同选家的眼光在某些重要的论著上会形成重叠,那么,同样也会出现一些大家都沒有注意到的盲点。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编纂的译丛,努力清除这些“盲点”,使读者对整个国外思潮有全面的了解。

在某种意义上,编纂译丛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杨绛先生认为,翻译中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像抓虱子一样,是抓不完的。然而,反过来说,这并不能成为降低译文质量的理由。我们殷切地希望,通过译丛编委会、译者和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积极把好质量关,使本译丛成为译丛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当然,本译丛所选著述的观点并不代表编委会、译者和出版社的观点,只是想为读者提供一份可资借鉴的研究资料。

前 言

在几乎 50 年的时间里,我从事哲学史过程理论的研究。不仅在《哲学问题》、《哲学科学》等杂志上和各种论文集中发表数量众多的文章,而且撰写多部专著,如《哲学史科学的问题》(1969 年)、《主要哲学流派》(1979 年)、《哲学史过程的理论基础》(1983 年)等。最后一部著作是和阿·谢·博戈莫洛夫共同完成的(他负责撰写第三、四章,谈哲学史作为科学的问题,我承担绪论、第一、二、五章和结论部分,研究哲学史过程的理论)。这些论著的主要缺陷在于持有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看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终结了数百年哲学史过程的科学的哲学。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后产生的所有哲学学说是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结果,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古典哲学体系比较起来是个倒退。

因此,我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辩证唯物主义阐述为独立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在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完成,无需批判性地掌握其后产生的任何哲学学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孤立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反映了我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而且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内在所固有的教条主义^①。

^① 即使像安·葛兰西这样无疑颇具创造力而且见解独到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教条主义的评价,他称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那些认为实践哲学不是同一切传统的哲学体系和宗教相对立的具有完全自主和独立的思想体系的人,如果不是直接投降,实际上也没有彻底割断同旧世界的联系。实践哲学不需要异己做靠山;它本身就十分强大且富含新真理,旧世界转向实践哲学是为了以更现代更有效的武器充实自己的武器库。这意味着实践哲学扮演着传统文化主宰者的角色,不过,仍在起作用而且更精致更守旧的传统文化,企图像战败的希腊那样进行反攻,打算最终战胜不文明的罗马胜利者。”(67,293)在前一页葛兰西更生硬地表达了自己的孤立主义的哲学立场:实践哲学“不需要从外部来加以补充”;它

[8] 我(以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史过程的教条主义理解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坚信数不清的相互排斥的哲学学说的存在及其不断的冲突是历史的暂时过程。其实,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所有哲学家都抱有这种错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们创立的哲学体系不仅是最高的而且是最后的哲学,解决了困扰前辈们的所有问题。这些伟大的哲学家没有一个人想过,形形色色的哲学学说和各式各样的哲学问题有说服力地说明了哲学思想宝库是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多样性正是哲学的 modus vivendi(存在方式),其巨大意义不可低估。的确,黑格尔作过一些卓有成效的尝试,试图结束一些人认为的哲学体系的混乱无序状态,试图把相互排斥的哲学样式看成是哲学发展合乎逻辑的(和历史的)阶段。然而,他却试图证明,哲学在任何时代都是相同的,各哲学体系之间的差异是哲学自我意识在发展中内在固有的差异,也是在哲学的基本同一性之内的差异,这就大错特错了。如同自己的前辈一样,黑格尔注定错误地认为,他所创立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终结了数百年的哲学发展进程。继黑格尔之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也认同这一错误认识,他们当然地认为终结这一过程的不是黑格尔的体系,而是他们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仅作了扼要的描述,却含有各种矛盾、问题和谬误。

我在《哲学史哲学》(1999 年)这部专著中阐述了对哲学学说多样性的全新认识。尽管我丝毫未放弃这部书的观点,但很清楚要对它们进行更详尽的理论论证。这就是本专著的基本任务。

在着手撰写这部专著之前,我系统地,当然以批判的态度重读了我[9]以前研究哲学史过程的成果,首先这就是《哲学史科学的问题》、《主要哲学流派》、《哲学史过程的理论基础》。我很清楚,教条主义的马克思

“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不仅可以构建完整充分的世界观、完整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而且可以使全部社会组织变得生机勃勃,也就是说成为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文明体”。(67,292)这些教条主义的说法令人十分惊奇,在许多问题上,葛兰西实际上赞成接近于新黑格尔学派的贝·克罗齐的哲学世界观。

前　　言

主义观点和结论不过是一些观点和结论,我的这些著作的实际内容就是进行具体的哲学史研究,虽然远未摆脱教条,但对进一步完善有关研究却是完全有用的材料,当然还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仔细的加工。

《哲学史科学的问题》这部专著被译成七种语言(英语、阿拉伯语、匈牙利语、希腊语、德语、葡萄牙语和法语)。我指出这个事实是为了表明,那些决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结论构成了这部书最主要的内容,因此引起了国外哲学界的兴趣。上面提到的另两本专著也被译成了外语。所有这一切使我相信,在撰写这部新的专著时,上述专著的具体内容可以并且应该视为可利用的材料,我希望,这部新的专著将是对以前关于哲学史过程基本特点的所有研究的一个总结。

在这一前言的最后,我想对我在科学院哲学所的同事、年轻的研究人员因加·阿列克谢耶夫娜·拉夫连季耶娃表达诚挚的感谢,她不仅帮我把这本专著的手稿录入电脑,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本书根据 Ойзерман Т.И.

Метафилософия. Теория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Т. И. Ойзерман.—М.:《Канон+》РООИ《Реабилитация》,2009.—440 с.翻译。

本作品中文专有出版权由中华版权代理中心代理取得,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01-2010-0772

目 录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译丛”序言	1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哲学的产生。古希腊语中的新词“哲学”	20
1.“神”的智慧的世俗化	20
2.人的智慧的神化	31
3.近代——哲学知识的新理想	34
4.智慧问题是现实问题	39
第二章 “什么是哲学?”问题的意义	46
1.哲学自身之问题	46
2.哲学的自我界定、自我认识和自决	62
3.理论思维最初的历史形式	67
4.社会意识的异化形式	70
5.社会意识或科学?	75
6.对“什么是哲学?”问题的存在主义解释的批判	79
第三章 哲学与所谓实证科学的区别	84
1.知识形式的质的多样性	84
2.思辨、逻辑、事实	86
3.直觉、真理、创造性的想象力	94
4.解释作为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	100
5.对多种内容的理论综合	110

第四章 尝试从理论上总结“什么是哲学?”问题的讨论	118
1.哲学史发展的独特性越来越难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118
2.对哲学定义进行分类的尝试	127
3.哲学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	142
第五章 不应夸大哲学问题的独特性吗?	152
1.不能留而不答的问题	152
2.旧问题和新问题,永恒问题和暂时问题	171
第六章 “哲学对象”概念不排除哲学学说的多样性吗?	178
1.成问题的“哲学对象”概念	178
2.哲学的基本论题	187
第七章 哲学的基本问题	204
第八章 作为哲学史研究对象的哲学流派	273
1.关于各流派之间的争论或各流派内部的争论	273
2.作为哲学流派的形而上学体系	282
3.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彻底革新	295
4.作为哲学流派的怀疑论	301
第九章 作为哲学问题的哲学发展	314
1.“发展”概念的问题总汇	314
2.哲学发展的客观制约性	332
3.哲学学说的分化、分散化和两极化	341
第十章 谁在批判唯心主义? 谁在批判唯物主义? 哲学有党性吗?	350
1.唯心主义者是唯心主义的批判者	350
2.谁在批判唯物主义?	357
3.哲学有党性吗?	359
后记	373
文献索引	378

绪 论

哲学怎样对待自己的过去,也就是以往的哲学发展?哲学怎样对待哲学史,也就是自己过去的研究?哲学史过程的研究同各种哲学之间,也就是多样的哲学学说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哲学史研究同作为学科的科学史之间有怎样的区别?哲学史科学在哲学知识发展中的作用是怎样的?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我认为,理论上的研究对于理解哲学的本质和哲学史过程的规律,也即哲学知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低估作为科学的哲学史,也如低估科学史领域的研究一样,是一个影响甚广的现象。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对科学史缺乏特别的兴趣首先是因为,过去发现的一切真理,科学技术人员取得的一切成果(如果还未过时的话)都被纳入了现代科学。由此得出结论,科学的过去,由许多错误认识组成,今天已经引起我们的兴趣,已经不为现代科学所接受,因为现代科学家的错误认识同其前辈的错误认识有区别,正如现代科学与因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而被超越的自己的过去有区别一样。尽管本世纪一些最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从事过科学史领域的基础性研究,但仍显露出对这种研究重视得不够。值得对未必会再现的过去的错误认识进行研究吗?詹·克·麦克斯韦对这个决非修辞学问题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写道,“科学史不只列举那些成功的科学研究。它应该告诉我们那些失败的科学研究,解释为什么一些最有才华的人没能找到打开知识之门的钥匙,而另一些人的声望又如何使他们犯的错误根深蒂固。”(131,39)

科学的研究与科学史研究的对立,如同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对立一样,在不小程度上是因为相信,科学史(以及哲学史)说的是已知的东西,因

此不会导致发现未知。这种看法只在科学史(或哲学史)具有经验描述性
[11] 时才是正确的。而我指的是对科学(和哲学)知识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理论研究:正如一切研究一样,它将导致不可预知的结果。

哲学史过程与科学的发展有本质的不同,这可以解释为哲学具有不同于任何专门的科学研究领域的特点。哲学常常存在许多势不两立的理论;哲学发展的特征是哲学学说明显地趋于多样和多元,并带有极端性,这是相互对抗、通常相互排斥的哲学学说必需和必然发生的冲突所导致的。正因为如此,哲学史作为科学在哲学研究(和教育)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任何一门学科史所无法比拟的,无论它对科学认识和教育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当代科学主要研究过去所不知道的对象。现在许多学科(包括基础研究领域)以前根本不存在;甚至半世纪前都可能存在。然而,当代哲学研究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和一定意义上仍是以前研究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在文明的萌芽时期就产生了。我下面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这里要特别强调,哲学的大部分基本问题是同哲学本身一起产生的,这说明了哲学知识的独特性质。因此,哲学史家面向过去,所研究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后来的发展仍具有意义。当然,当代提出这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与过去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由哲学史研究来阐明。哲学史研究揭示了哲学知识的矛盾及其辩证统一性,这是人类历史同样的矛盾统一性在精神方面的体现。

我把哲学史视做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统一。不过,必须具体地提出问题,因为许多哲学史家悲观地评价所从事的研究的可能性和前景。我以著名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约·伯奈特为例。他写道:“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在哲学史研究中取得成就,因为哲学学说同艺术作品一样,是极其个人的东西。”[12] 实际上柏拉图也相信,任何一个哲学真理通常不能以书面形式传播:只能通过特别直接的途径把火种(真理——作者注)从一个人的手上传递到另一个人的手上。”(234,1)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史家还能做什么?在伯奈特看来,哲学史家应该讲述哲学家创作的时代和条件,讲述哲学家的个人生活,讲述他与之交往的哲学家,讲述给予他影响的学说,讲述他反对的理论,

讲述哲学家的著作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以及同时代人怎样理解哲学家的著作,等等。伯奈特认为,哲学史研究的使命只是履行辅助功能。因此,它应该极具经验性,尽可能排除研究者个人的任何理论观点。伯奈特自己大概没有意识到,他表达了对哲学的一种十分明确的理论认识。其实,不可能有另外的认识。不遵循特定的、足够广泛的且经常变动的价值尺度,就不可能经验地、单纯“历史地”研究和阐述哲学史。这些价值尺度正是从哲学史当中,从人类一般的认识史和历史发展中获得的。即使把发展的概念运用到哲学史当中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前提,尤其是要承认哲学发生着不可逆的变化、变革和进步。根据我希望在本书中加以论证的观点,无论限于什么研究任务,对哲学史过程的理论思考对于这一领域的任何研究来说都是必需的。

哲学史研究就其“风格”来说各种各样。有的著作讨论了某一民族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的研究涉及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哲学发展,在这种研究中,某一民族的哲学思想作为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出现。涉及认识论、本体论、辩证法、自然哲学、伦理学、个别哲学思潮和流派、哲学家等等发展状况的著作,是哲学史研究的特殊形式。这些类型中的每一个哲学史研究都有自己的专门任务,都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理论问题。比如,哲学史中的矛盾问题是一个专门研究的课题,如果研究者对哲学问题的独特性缺乏必要的科学认识,我认为,它就不可能得到圆满解决。不但如此,为了仔细研究哲学史中矛盾概念的发展,还必须或多或少明确认识下述问题:以哲学方式认识现实的特点,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解决矛盾问题的各种哲学方法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

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哲学;哲学史科学的问题是哲学问题。这些原理 [13] 是无可争议的。尽管西塞罗断言,证明只会降低事物的无可争议性,但我却认为,仍然需要对它们进行证明和理论论证,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就致力于此。当然,在绪论部分我只限于指出,不是任何哲学史研究都是哲学研究。哲学史过程的哲学研究要以对它的理论解释为前提,这一点其实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没有一个哲学问题,哲学史科学没有研究过,虽然并非每个哲学学说都

包括所有哲学问题。此外,哲学史科学包括那些未纳入哲学对象的问题。这包括哲学知识的历史问题:它的产生、发展、社会制约性、认识论根源,等等。不仅如此,依我看,哲学史科学不是一种“对接的”学科:它的起源不是历史和哲学这两个彼此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的“交叉”,而是客观所制约的哲学知识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对这一发展的批判性思考和自我意识。

哲学史问题的产生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处于哲学和历史学的权限之外。同所有哲学问题一样,哲学史问题在全人类的日常经验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科学和哲学认识的过程中形成。哲学史家无疑应成为不折不扣的历史学家。尽管对产生一定的哲学学说的社会条件进行认真的、符合历史科学严格要求的研究的意义十分重大,哲学史家的主要任务却是理解和批判性地思考这一学说,弄清它与其他哲学学说由社会历史过程决定的联系。从这个观点出发,哲学史科学是特殊的哲学研究,是哲学的哲学,或者是元哲学。其任务主要在于揭示哲学学说中所隐含的、哲学体系的创造者并未明确指出来的卓越思想、真知灼见和对未来的预见。

[14] 哲学史研究,由于从理论上概括了认识的一定的历史过程,其使命是发展认识论。所有这些令人信服地说明,哲学史科学实际的理论基础只能是哲学史过程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如同每一个一般的哲学学说,首先要具有明确的立场,这个立场,假定可以称之为党性的立场,当然这不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党性。因此,存在各种哲学史过程的理论——经验的、理性的、非理性的、唯物的、唯心的、实证的,等等。

想要找到一个“绝对的”,即不依赖特定的哲学观点的标尺,在哲学史中是不可能的,正如在物理学中一样。在这里不难发现对“非党性”似是而非的要求。非党性是不可能的,如同真正的思想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观点一样。“非党性”的信徒实际上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哲学史家对这样那样的学说有不同评价,不是因为他们对史料及其一切相关的事实在研究得不够充分,也不是因为他们偏离了以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来进行科学的研究的要求。问题的本质要深刻得多。

任何叙述都不是逐字逐句地重复这位或那位哲学家写过的东西,至少是用自己的话加以转述。然而,任何研究哲学发展历史过程的严肃学者只